

我的一九八九——一位學生黨支部書記的自述

forget1989

1999 年 12 月 26 日

提要：

- [前言](#)
- [入黨](#)
- [運動前夜](#)
- [4 月 15 日](#)
- [運動初期](#)
- [“新華門血案”](#)
- [4.22 悼胡](#)
- [運動組織中的問題](#)
- [“四二七”大遊行](#)
- [廣場絕食風潮](#)
- [復食與戒嚴](#)
- [脫離運動](#)
- [開槍之後](#)
- [一個復員坦克兵的遭遇](#)
- [結語](#)
- 編者插圖。 [何處招魂——民主之光耀邦 \(1\)](#)
 - [遊行去悼胡](#)
 - [四二七遊行-衝破封鎖線\(友誼賓館\)](#)
 - [生命線上的救護車](#)
 - [趙紫陽看望絕食學生](#)
 - [六四當日的中央財經學院](#)

編者按

這篇十年後的追憶，讀起來令人感覺相當真切。儘管些許細節和觀點尚有可探討處，但作為“為未來的歷史研究留下一份最大限度接近真實的個案調查資料”，堪稱範本。

作者當時既是大學生，又是黨支部書記，這樣的雙重身份決定了他在運動中內心極度的衝突。但作者沒有被潮流徹底席捲而去，苦苦地保有了自己獨立的角度和人格，實在難能可貴。這場運動是作者最終傾向於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起點，六四後的許多自由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也許都有類似的心路歷程。

原文本無小標題也未分頁，文中小標題和插圖為編者所加。

我的一九八九

作者: forget1989

前言

也許在經歷了北京 1989 年那場運動 10 年之後，作為一個那場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和記憶的主體，我該寫點什麼。我的學養和對歷史有限的感悟能力決定了我只能為未來的歷史研究留下一份最大限度接近真實的個案調查資料。這包括事實的和心理的。在這一事件中，我是一個追求心靈極度自由的獨立個體，這使得我的回憶只能從個人而不是社會和公眾的角度出發。雖然面對嚴酷的現實，個人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我仍舊覺得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行動。古人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這是對於黑暗歷史的控訴與反諷，我自認應該做超越古人的新事，這也是一個“自由人”的心靈訴求和應有的態度。

這是寫給我自己看的，同時也是寫給我的靈魂同盟者，以作為我們對共同經歷的時代作出的一份私人交待。歷史自身的複雜發展、無量的變數以及對於個人和他者無窮無盡難以估量的種種影響，使我的立場不得不停留在個人的成長與認知上。這是一份在迷失的年代，經歷了青春理性迷失之後的內心痛苦無依的傾訴，也是一份用特定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的眼睛看待社會和世界的三維立體畫我堅信，只有用自己的眼睛才能找到我們自己。

個人的敘述，對於我來說，既有極大的自由也有極大的盲區。一方面，我可以信馬由韁，詳盡敘述我在事件發生前後以及過程中的種種感覺，然而這樣卻難免與事件本身嚴重隔閡，無法準確、客觀、深入地描述出當時的社會和當時的我們。另一方面，結合個人經歷，對於事件本身進行歷史和文化的探討，又有我力所不逮的艱難。但是，我願意作這樣的努力，力求我的文章在後一個方面有所進益。與此同時，我在本文中力圖避免個人色彩的消褪，爭取在歷史大潮中留下個人，當然不是我。我，是作為那個時代遠離政治、文化潮流和社會生活的一個精神自我放逐的青年的標本。

在那個青春激盪的年代，我親眼目睹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的興起和衰落，從中深刻地體會到作為無知與盲從者的青年在歷史事件中的升騰和墜落。我還親眼看到事件發生過程中的種種人和事，看到在不同認識程度和動機下，

人們的反映和態度。作為一個不諳世事、尤其是不懂政治黑幕背後的真相和種種思潮背後的政治目的的青年，我能夠以勇氣、真誠和坦然，面對所有發生過和未發生的一切。也許這樣就已經足夠。

入黨

我的追憶將從我身處的時代和當時我的思想狀況開始。

1987年9月暑假過後，我來到北京讀大學。這是我首次走出家鄉200公里方圓的地域，獨自開始我的精神漂泊。在此之前，我所生活的小城只通行簡單的生活邏輯讀書是為了將來的飯碗，作官是為了雞犬能夠升天。知識分子（如果這個小城中還有知識分子的話，那麼它可能僅指教育工作者）有著僅限於教科書和參考資料的知識面和與小市民無異的生存哲學，此外就是無所不在的政治現實和人們臉上日復一日同樣的麻木表情。

在我讀高中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嚴重影響我個人成長的政治事件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肯定地說，從我“加入”的1986年直到如今的1999年，我沒有完整地閱讀過《共產黨宣言》，並在信仰上對於共產主義一直沒有任何認識。而我的這一違反黨章規定的提前（我還不滿18周歲）的“加入”，完全是母親的悉心塑造和老師的殷切關懷作出的越俎代庖行為。事實上，我成為別人實用主義理想的實現者——當然別人有著善意的初衷——而唯獨不是我自己的什麼。我們的社會和現實，從一開始就沒有為個人的心靈和自我留下哪怕是小小的空間，在廣大的範圍內，幾乎沒有人能夠為自己負責，也沒有人具備這樣自我要求的權力，起碼在我們的小城是這樣。因此，在我“入黨”的問題上，我是母親高官迷夢的初步實現和學校黨委黨員報表上的一個醒目的數字……這一意外在我懵懂的時候，時常成為我暗地裏沾沾自喜乃至與14歲加入共產黨並為主義獻身的劉胡蘭相對比的因由。現在我終於懂得，除去當時的歷史因素外，劉胡蘭的獻身，極有可能是信仰之外的仇恨和愚昧作怪而非對共產主義的理性認同使然。這一看法可以驗之於眾多走過千山萬水而唯獨在得江山之後腐敗變質、喪失共產主義信仰的從前堅定的革命者和如今死不悔改的階下囚身上。很難想像一個不滿18歲的黨員對於共產主義有什麼理性乃至信仰的認識。這一個人的“政治事件”在我後來的成長過程中，將直接影響到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最終也鑄成了我在現實中的矛盾表現。

可以說，在離開家鄉之前，我生活在一個非人和無知的空間裏，我的知識僅限於幾千頁課本和幼時出於飢渴而自發閱讀的古典小說。而這一切，一到北京就馬上化為塵埃與空氣，成為與我本人無直接關係的元素。對於政治和現實，我的了解只限於高考應試必備的時事政治資料，它在我的心中像空中的標語一樣簡單、凌亂。我是帶著故鄉人常有的茫然和呆板來到北京這個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

運動前夜



此時北京的大學校園，在瀰漫著尼采和叔本華的哲學、流傳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的同時，也盛行著極度頹廢的厭學風和過於普遍的經商熱。學

生們生活在無理想、無目的和對金錢的渴望當中【近】。毫無疑問，是社會和政

治現實玷污了原本神聖的學術殿堂。這都是與我心目中的大學相距甚遠的。我知道大學是研究學問的地方，是向社會提供思想、精神動力和知識技能的養成所，可是當我終日面對著馬列主義教授千篇一律的面孔和虛浮而脫離實際的說詞的時候，我的內心產生了對於前途的迷茫和頹廢的最初衝動。我曾經嘗試過作小買賣賺錢、躺在被窩裏不去上課，也曾在青春激盪下追逐異性的青睞……然而，當我的一切努力終於都化為泡沫以後，精神極度疲憊的我便陷入了深深的悲觀。它主要來源於理性的軟弱和盲目的自大。悲觀對於我來說，原因在於對個人未來的無從把握，它不但決定於我的專業與現實的深刻脫節，而且也源自於個性的軟弱和逃脫家庭束縛後的無節制的沉淪；我的自大源自於小知識分子父親遺傳的清高，也許還包含著來自於小城愚眾的見識短淺的恭維。這一切，鑄成了我沒有根基的習慣性的悲觀表情，而這表情莫名其妙地在他人面前成為我高深莫測的面具，以致最終化為我的個性的一部分。在這種互相關聯的因果鏈條中，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終日虛浮而寥落，像一片隨波逐流的樹葉。

我就是這樣，生活在 1989 年的前夜。而後來我才知道，此時的國家與社會，正在緊鑼密鼓地醞釀著巨大的事變。街上形色匆匆的人群，事實上並非是我眼中千篇一律的表情，幾乎每個人的心中，都掀動著巨大的波瀾，躁動、躁動、躁動，仿佛在等待著什麼，火焰在地表之下潛行……作為我個人，因為身處這樣一個時代裏和特定的高級知識分子群落中，不能不知道這樣一些詞匯：官倒、腐敗、多黨制、民主……可是，我對它們的理解也僅僅停留在字面，根本未能達到上升到政治認識的程度。那時，我不知道自己那時在做著和想著什麼，儘管我無論如何不是一個愚鈍的人。我就是這樣，生活在 1989 年的前夜。

最為可笑的是，因為我少年共產黨的身份，我幾乎一上大學就而成為學生幹部，它可以說是一個學生中的特殊階層，象徵著畢業後良好的出路和有限地主宰別人發展的權力。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我的同意，我們班上哪一個學生要加入黨組織是很難的，這不單因為我獨特的黨員學生幹部位置，而且還與老師們對於學生真正的思想狀況普遍缺乏關心和了解有直接關係。多年以後，我為此而羞恥，不是為了我如何阻礙了某些人的發展道路事實上讓他們入了黨對於他們一生也沒有什麼好處，而是因為我過早地與小政治和小權術發生了骯髒的關係，和在內心深處曾經為之沾沾自喜的不幸與淺薄……在與小政治發生的骯髒關聯中，我的內心激起了對政治的盲目興趣，因為我直接在小小的圈子中體驗到了權力的魔力和縱橫捭闔的快慰，而這所有的一切，都在後來如火如荼的運動中遭遇了徹底的破滅和殘酷的自我否定。我就是這樣，生活在 1989 年的前夜。

那時，我渴望變化，渴望衝突，渴望刺激，凡是與眾不同的事物，都是我歡迎的東西。只是我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別人，更不了解社會和政治，不知道這種種表現序幕過後，我們會迎來怎樣的現實和未來？可是，如今我已知道，對於我來說，30 歲的晚知道也許比 20 歲的早知道要深刻而具體，因為人的成長與歷史階段同樣不可逾越。我不悔恨自己的無知和虛妄，如果 1989 那場風波遲遲不來，會宿命地延遲我成熟的時間！我對此深信不疑。它簡直就是我的青春和我的大學。

4 月 15 日

1989 年 4 月 15 日，那是個沒有任何特殊之處的一天。但是，很多人的生命之舟在這一天發生了急劇的逆轉，有人升騰，有人墜落，有人身陷囹圄，有人遠走異國。命運像一葉小舟從原本平穩的河道突然拐進滿是激流、礁石和險灘的山谷，生命之舟在劇烈地顛簸、震盪。我的青春和生命就此捲入靈魂的煉獄，承受了正義與邪惡、犧牲和苟且、混沌與清晰的多重考驗。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衝擊和震顫，它為我的血管灌注了亢進的血漿，激盪出青春的心鼓。

這一天對於胡耀邦本人來說，除了具有靈與肉由合到分生命意義之外，還外在地加上了一種任何導演都無法預料的效果由於後來風波的影響和發展，他獲得了無法複製的歷史意義和歷史永恆。以致於人們每一想到 1989 年激盪的年代，就會想到胡耀邦這個人。這一切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在胡耀邦之死帶來的歷史中，不同程度地打下了個人的烙印。對於每一個親歷的成長中的青年來說，這種歷史變故的衝撞和烙傷，必將終生不會消褪。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

下午 4 點以後，我在操場邊懶散地觀看班上的男女混合排球賽。天氣有些陰，偶爾一陣風會刮起地上的塵土。我不是體育愛好者，當時我除了惡意地起哄和挖苦別人奇形怪狀的表演之外，只是“深刻”地站在操場上，覺得自己無聊而孤獨。五點是吃飯的時間，於是我進入了一天的最後一個儀式——吃晚飯，與平時也沒有任何不同。我曾經細細地回顧那天的每一個細節，確實沒有任何事變的預兆。可是沒有人阻擋得住宿命和歷史的腳步——我在回宿舍的路上聽到了哀樂，它來自研究生宿舍樓的某個窗戶，而且很快我得知了胡耀邦猝死的消息。

我曾經不只一次地反思自己對於胡耀邦的認識——我對於胡耀邦對於知識分子的態度一無所知，我不知道他在國家的動亂年代如何關心科技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也不知道何以眾多的知識分子將胡耀邦引為知識分子的知己和朋友。我只是知道，胡耀邦是已經下臺的原中共中央總書記。也許在內心深處，我有著對於一個大勢已去的政治明星的同情與憐惜。然而更多的是對於公眾共同關心事物的絕對盲從。正是因為別人的認同，也使我盲目地開始認同了別人的眼睛，這

就是全部。當一切順理成章的民間悼念成為事實之後，我的悼念中開始逐漸滋長起一種參與歷史活動的單純想法，以及隱含的為發泄心中鬱悶和焦慮的唯恐天下不亂的情緒釋放。但是與此同時，在我的身上，也包含著極端的虛無主義，我對別人不知出自何處的過於激昂的憤怒感到有些厭惡。政治離我們何其遙遠，對於政治本身，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又能產生什麼影響？我們憑借什麼參與政治這無邊無涯的鐵幕？在我的心目中，胡耀邦之死同所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逝世沒有區別，過後現實還是原有的現實，歷史也必將一如既往地發展。

可是，就在我懵懵懂懂地受到情性自我影響的時候，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事變，地火已經成為熔岩，正在火山口噴薄而出。大約是在當天晚上 8、9 點鐘的時候，我們的班主任老師——一位後來參與編輯動亂後學習材料的、表面和言論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人來到我們的寢室，是他告訴了我們事變的消息——現在外面沸沸揚揚，同學們要保持冷靜，凡事要用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去判斷，不可盲從。聽到這樣的叮囑，我的神經一下子緊繃起來，發生了什麼事？強烈的好奇嚴重地刺激了我，使我無法安坐在溫暖的寢室中。於是我跳將出門，來到學校的消息欄前。從此開始捲入無可逃避的歷史。

看到那裏的景象，我有些吃驚——無法統計的大字報、小字報張貼在布告欄和學生宿舍的門楣、窗戶上，外面圍著黑壓壓的人群，多數是如我一樣來看熱鬧和感受氣氛的。有人在五樓上燒著報紙或衛生紙，飄飄搖搖地在天上凌空飛舞。漫天的黑紙灰和低沉、悲愴的哀樂，使乍暖還寒的初春之夜變得冷酷和凝重。大字報的內容多數是悼念胡耀邦之死的，然而最搶眼的還是對於當局的控訴、抗議和咒罵。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著名的大字報——“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倒死了！”之類。我當時有點預感：北京可能要爆發一場政治運動，大概與中央批判的自由化思潮有關。所謂“該死的”恐怕是鄧小平吧？“不該死”的則是胡耀邦無疑。看到這些煽惑人心的內容，我的心中也升起一股莫名的衝動，感到渾身的血液在沸騰、在燃燒。我甚至隱隱地有一種終於有事可做的快感。這與我平時一貫懶散、無所事事而又渴望有所作為的心理有關。

我回到宿舍，任憑是什麼樣的言語都無法平息掉青春生命的激烈衝動。我們是年青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這樣的歷史關頭，我們怎能不發表我們的態度？幾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間小小的寢室中，不知所以然地談論著心中的感受和想法。當晚，我和幾個喜歡舞文弄墨的同學一起，起草了幾份大字報。內容已經記不清了，反正主要是悼念胡耀邦和影影綽綽、含混地發泄了一通對現政權的不滿。這是我對於青春運動的祭獻。

事後我分析自己的衝動行為的原因如下：一是要參與歷史；二是發泄對現實的不滿，其中很大成份是不知其所以然的不滿；三是表現一下自己的“才華”以獲得別人的讚譽。記得當時我自己還在心中告誡自己：你是黨支部書記，不要捲入太深，政治這東西骯髒而恐怖，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我的行動除了極少數人目睹之外，並不為很多人所熟知。現在我深知自己的愚昧和膽怯給自己留下怎樣的生命創痛，同時我也客觀地認定，我是在竭力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世界並參與歷

史，我不是盲從的。我是在竭力追趕時代的步伐並且竭力認識我們所共同生活的時代。比起那些在運動中喋血的人來說，我在一定程度上動機不夠純潔，但是我始終堅信，在政治鬥爭和歷史主體的實踐中，要保留自己的個人自由，用自己的目光觀察和判斷世界是必須的，也是起碼的素質。同時，我也為在運動中失掉自己的生命、青春和熱血並失去彌補機會的年輕的朋友感到惋惜，在對他們的悲悼中，永遠有著我未能與同齡人共同拋灑青春熱血的歉疚。但理智地講，我依然為自己的不盲從而驕傲，雖然它不一定是在理智基礎上的正確選擇。

4月15日這一天，是我走向成熟的開始，也是我有限捲入這場運動的第一天。這一天對於我個人成長的意義，無論怎樣估價都不會過分，它決定了我在運動中的表現，和以後政治態度和生活態度的走向。我願意以一個當事人和反思者的身份，毫無保留地展露我的心靈，留給未來的人們。

運動初期



4月16日清晨，我一大早就爬起床和同室的朋友們趕往北大去。北大是學生運動的旗幟和晴雨表。北大的介入程度幾乎可以決定整個學生運動的深入程度。

這天北京大學依舊是楊柳輕拂，初春的嫩綠已經開始染上樹枝的梢頭。然而整個校園的氣氛確是熱氣騰騰，路上的每個人都心事重重，像是沉思著正在發生的事變。我們來到北大的輿論集中地——三角地。這裏早已是人頭攢動，人們爭先恐後地將頭伸向貼滿大字報和小字報的牆壁和櫥窗。整個景象跟我看到的文革中的北大極相類似。大字報的內容現在已經多半忘記了，唯一的感覺是北大的大字報水平也一般，沒有什麼新的氣象和更為尖銳的東西。我知道，運動一開始，我心中固有的麻木也同興奮一起潛滋暗長著，構成我矛盾人格中兩個對立的基本成份。我幾乎是機械地抄錄著自認為有價值的大字報，但隨後就厭倦了，隨手抄錄的東西在多年以後也不知道丟到哪裏去了，以致我現在回想起來都有些語焉不詳。

記得回到學校以後，系黨總支給我們所有黨員和學生幹部開會，指示我們不能參與與我們身份不相襯的活動，有情況要及時向組織匯報，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時，罷課逐步開始了。然而就在這時候，一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

4月17日，聽說我們班上的某某女同學的名字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自發給胡耀邦送的花圈上，她本人對此事毫無所知，據說是因為他的男朋友所為。這位“男朋友”是我們本系的研究生，這次悼念活動的主動參加者。我得到這樣的消息後很吃驚，隱隱感到在這場運動來臨之際，人們對於參與還是不參與，可能都會遇到無能為力的情況，而我本人對於這種強姦他人名義的行為十分反感。可以說，這是一種赤裸裸地、以所謂“革命”和“正義”的名義對

個人權力的無恥剝奪，也許這其中還有“愛的強制”，但我始終認為，無論以多麼高尚和美麗的藉口，都無法掩蓋這其中真正的實質——專制、野蠻和虛偽。我沒有就此事詢問過我的同學，但是，我覺得任何人如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別人冒用名義去做任何事，都會產生憤怒情緒。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同學畢業後嫁給了這位研究生，而且為他生了兒子，現在一家人就愉快而幸福地生活在某城市中。於是現在我想，也許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自由和權利對於他們自己來說並不能說明什麼，他們僅僅需要質量很低的生活。也許這就是中國老百姓的政治生活現狀吧！也就是因為如此，他們在被官方、群體和他人無數次地侵犯了和侵犯著基本的自由民主權利的同時，渾然不覺，渾渾噩噩地生活著。

與此同時，我的自由和權利也受到了覬覦——我之所以這樣說，僅僅是因為我覺得我有權利決定我個人的行動，別人對於我來說，沒有意義。我能夠對自己負責也應該為自己負責。

又是那些以拯救國家民族為己任的研究生，找到了我這個學生黨支部書記和其他一些學生骨幹，舉行了一次“地下集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在全校大搞一場悼念胡耀邦的追悼活動。這次活動明確地受到學校當局的阻攔。

我並不反對利用各種形式悼念胡耀邦同志，包括在沒有徵得校方同意的情況下自行組織悼念活動。但是，由於當時局勢異常複雜，我對此保留了基本的警惕。

他們的行動十分詭秘，在集會開始的時候，緊緊地栓上了門。這些年輕的“革命者”並沒有向我們作任何鼓動和對於這次行動的解釋，甚至連基本的情況都沒有向我們通報，就向我們布置起任務來了。分給我的任務是到相鄰的幾個學校去貼海報，向更多的人宣傳我們的“革命行動”。我不是他們的同道，但在當時的情勢下，我無法面對面地反對他們的頤指氣使。我知道，很多人的眼睛正在盯著那些異己的人，就像座山雕拷問樂平和楊子榮一樣，稍有破綻就會大開殺戒，我只能默默地在心中打著自己的算盤……自然，我沒有參與他們的活動，但也沒有向組織通報任何消息。這是我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基本信念——不出賣別人、不背叛自己。由此，我開始注意到一個問題：為什麼總是“研究生”們侵犯我們的權益？回想人民共和國走過的歷史，多少戴著高尚面具的罪惡在巨人的號召下大行其道，多少受人景仰的知識分子舉起受命於人的旗幟，將無數無知者的真誠帶進有去無回的山谷……原因在於，這些人自恃道德優勢、政治優勢和知識優勢，凌駕於普通人之上，而普通人盲目地在權力和知識面前拋棄了自我，甚至將寶貴的自由和權利交給了虛偽的政客和幕僚知識分子，任憑他們踐踏和蹂躪。我們難道不該警惕所有的強權和偽善嗎？包括政治的、道德的和知識的。

“新華門血案”



4月19日，我按期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參加了這次悼念活動。原定在校內改為到天安門廣場敬獻花圈。我了解歷史上天安門廣場對於集會的重要性，歷史

上它就 是上演英雄史劇或鬧劇的最好舞臺，我要親身感受歷史風雨。出於我是黨支部書記的特殊性，在系領導對學生上街無力阻攔的情況下，他們叮囑我將同學們組織起來，大家同去同歸，以免發生意外事件【近】。我接受了老師的囑托，可是天知道我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隊伍像一條激越的河流，流向廣場，流向不知名的地方和結局。我們一行人顯得精神高亢，緊跟在正式隊伍的後面。晚上大概 8 時左右，我們趕到了天安門廣場。整個廣場人頭攢動，新聞記者的閃光燈和攝影燈在夜空中發出耀目的閃爍，人心沸騰而躍動。在這樣的情緒和環境中，容不得哪一個人多想，我們便紛紛加入遊行行列。我看到忙碌的記者在攝影和攝像，心中有一點膽怯，這些影像將來很可能成為追查的證據，於是我低聲提醒我的同學們，用標語遮住自己的臉，作一點自我保護【近】。我記得當時我身邊的一位女同學用詭異的目光盯了我一眼，隨後將脖頸挺得筆直。顯然她很瞧不起我的退縮。我們就是這樣，舉著“中國魂”的巨幅標語【異】，繞場一周，然後送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基座，高高地懸掛在碑身上。隨後，隊伍向人民大會堂前靜坐的北大學生附近聚集。我站在後排，透過前面人的肩頭，看到靜穆的人民大會堂——它無聲地沉默著，似乎對外面的人們毫不理會，只有檐下幾盞孤燈，照耀著門柱下緊張而不知所措的工作人員。這裏的氣氛很緊張，黑暗中似乎有無數警惕的眼睛，打量著外面渾然不知危險和瘋狂忘形的人們。



沒有人理睬我們，緊繃著的神經也就鬆懈下來，我感到有些疲乏，就和同學們一起來到廣場中央，席地而坐，任初春夜晚的寒風吹拂著我的頭髮和臉龐。此刻我感到萬分自由，大家團團而坐，自由地爭論、自由地發表意見，思想像遊龍一般出入於雲霄和海洋……

我們的隊伍已經散於無形了，大家紛紛按著自己的意願，三五成群地走向西單方向。我本以為當晚的活動已經結束，但當我們來到新華門的時候，我不由得驚呆了！

大約有成百名學生擁堵在新華門前，他們舉著花圈，與臂臂相挽的警衛戰士對峙著，口中喊著“李鵬出來”的號子。我知道新華門是國務院所在地，是國家重要的機關。這裏極易釀成重大的流血事件，長時間對峙下去後果不堪設想。這使我想起段祺瑞執政府前倒在血泊中的劉和珍和楊德群……但我沒有馬上走開，站在一邊靜靜地觀察：我發現，在學生對峙的行列中，後面的人幾乎有些惡作劇似地向前擁擠，而前面的人明顯對臂臂相挽的解放軍戰士和新華門敞開的門口後面的黑暗充滿恐懼，他們幾乎是驚叫著抱住柱子和石獅子的底座。看來這種對峙在一般人的眼中是有限度的，真正為了理想和自由不惜流血的人，實在是微乎其微。這樣的結論是逐漸被我後來的耳聞目睹所驗證的。我的同學中就有入當晚英勇地戰鬥在對峙的第一線，從他們歸來後自豪而驚魂未定的樣子中，

我仿佛聽到了事件在每個人心中的真正回響。這個晚上，我很快離開了新華門，回到了學校。歸來後沒有人說起發生了什麼“血案”之類的話。第二天我們再次前往北大三角地看大字報的時候，我看到了對於“**新華門血案**”的宣傳。這與我所聽到的東西並不一致。然而，我似乎是願意接受學生慘遭毒打的信息，因為它使我感到亢奮和刺激，可以使我的激情獲得再次點燃。於是，我相信了這樣的傳言，並且在校內貼出了轉述“新華門血案”的大字報，內容就記在我的日記中。於是，在那個時刻，我又成了一個不太能為自己作主的人，這是我的動搖和盲從。關於這段事實，我一直耿耿於懷。我的內心矛盾在於：一、我不知道真相如何，但是卻傳播了事件的消息；二、我相信傳播這樣的消息對於運動本身和中國的民主運動在政治上是有利的。我該如何反思這樣的自己？但是現在，我自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於是我只能否定內心矛盾的後一方面。我該為不負責任地傳播這樣的信息而自責。

“新華門血案”消息的廣泛傳播，使叛逆的火焰進一步升騰。4月20日後，學校內罷課之風開始興起。學校開始出現了成立學生自治組織的苗頭——我系的一位同學（平時極度沉默寡言）冒雨參加了一次遊行。歸來後手中拿著一把雨傘。他神色莊嚴而凝重，仿佛身負沉重的歷史使命一般。我看到他這般形象，猛然想起過去時代的一幅油畫名作——《毛主席去安源》，心中不由得一陣凜然。看來自己的身邊真是藏龍臥虎啊！他對我們說：我見到了吾爾開希，其人如何如何。說話的時候，他的嘴裏的舌頭有些不自在，打著卷兒，不知是緊張還是覺得本人憑空高大了許多。也許當初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在蘇聯紅都見到列寧和斯大林才有這樣的獨特感受。當時我這樣想。我之所以這樣寫，就是因為我從骨子裏瞧不起這樣的人，用我們老家的說法，這叫“狗肚子裝不下二兩香油”。但是就是這樣一些人，構成了我校學生自治會最初的種子和班底。

4.22 悼胡

21日晚，我們隨著學生隊伍的洪流，簇擁在學校門口，據說是為了先去佔領天安門廣場，以便明天參加胡耀邦的追悼大會。按照事先不知是什麼人的安排，我們先要參加在師大舉行的誓師大會。現在想來，之所以說“誓師”，看來是一定有“險”可冒，有“誓”要發了。如果是現在，我一定會三思而行，可是當時，除了冒險的衝動外，就是一種對於新事物無限衝動和對強刺激的無限神往。一大群人簇擁在學校大門口，等待著其他先鋒隊伍的來到。一隊一隊的人過去了，他們打著各色各樣的旗幟和標語，頭上纏著白布條，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與有組織的隊伍相比，我們學校的人群雜亂而缺乏組織，因為校方早已將校旗控制起來，學生們的活動就像一群蒼蠅，到處亂撞。為了學校的榮譽和行動的有秩序，我們必須儘快找到一面旗幟，這是我當初的想法。於是，我就將我的想法付諸實施了。也許這是在這次風波中最富有亮色的行動了。



在我的印象中，那面著名的系旗一直被人不負責任地放置於宿舍樓的傳達室。我和另外一名同學便悄悄地趕回宿舍樓，隨之這面旗幟就成為這次 50 多天風波中最為醒目的一面。我在用無數雙臂組成的保護人牆中，一路趕往天安門廣場（事先安排在師大的誓師會沒有趕上）。

對於我這個身體不算很好的人來說，從海澱區到天安門廣場的集體徒步行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我被沸騰的人群夾裹著，直到渾身的汗水將我的羊毛衫濕透。一路上，我的心情緊張而激動，在冒險而又有些後怕的復合心情下，感受著巨大的興奮和愉悅。

凌晨 4 點，我們趕到了天安門廣場。平時空曠的廣場被從城市的各個角落湧來的大學生所佔據。北京春早，廣場上刮著強勁的北風。我被汗水打濕的衣服開始無法御寒了，貼在前胸後背上一陣陣發冷。我們坐在冰涼的廣場上，等待著天亮，期待著中央能夠給胡耀邦一個公正的評價，並對他的死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交代。然而，在這樣一個寒冷的早春之晨，我的“心中無神明”的宿疾開始發作——由於寒冷，我顧不得什麼大家為之不惜拋灑青春的胡耀邦之死，騎上別人的自行車，載著另一個同班同學，飛也似地逃回學校，只為溫暖我的身體。於是，我沒有看到“令人動容”的下跪請願的一幕。

對於下跪請願，我基本上持否定的態度。這完全是敵手之間大耍手腕的政客行徑。對於以民主和自由為旨歸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採用下跪這封建社會膜拜君王和神祇的方式是完全不符合言行一致的標準的。當然，這場下跪風波直接導致了學生運動的再次升溫，然而卻並不為我所贊同。

運動組織中的問題



回到學校以後的一、兩天，我目睹了我校學生自治會成立的全過程——當時，各校之間開始了串聯與遊行，大家在校際之間呼來喊去，壯大聲勢。一天，我校在學生校內遊行結束以後，隊伍被拉到大禮堂。領隊的早有計劃，他們扭開門鎖，將各隊人馬安排在大教室內坐定。大教室內旗幟招展，口號聲響徹一片。這時，一個手提小喇叭的學生走上主席臺，莊嚴地宣佈大會開始。當時，我不知道是什麼人主持，要開什麼會，只是習慣性地對這種亂哄哄的集會感到厭倦，於是我克制地使自己冷靜下來，竭力不使自己受到環境的影響，靜觀事態的發展。隨後，這裏上演了一臺齣劇——各色人等紛紛走上臺去，其中有很多平時所作所為令我非常不齒的人物。他們紛紛宣佈學生自治會正式成立，更為主要的是紛紛宣佈今後本校的行動將由“本人”統一指揮，仿佛他們正面對著一個人才市場，紛紛為自己招兵買馬，壯大自己的營壘。我不禁問自己：“難道他們不是一伙兒的嗎？他們事先沒有統一的安排嗎？這樣連一句完整而流暢的話都說不清楚的人能夠領導這次聲勢浩大的運動嗎？”於是，我得出結論：在這些人的領導下盲目行動不僅危險而且顯然是在背叛個人的理性，我必須要為自己負責。其後，在真正意義上，我沒有參與這樣的遊行。至於我有時也會出現在遊行的行列中，我是把這一切全部看作求知行動的。我知道，這樣下去，我終將脫

離運動的主流與群體，也最終背叛我所在集團的集體意志。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這不但標幟著一個人脫離群體而自行其是終將遭到集體的拋棄，而且個人還要咀嚼獨行的心靈苦澀，和對自我選擇是否正確、是否合乎正義和良心的道德拷問。至此，我最終成為一個獨立的個人。現在看來，我當時所尋求的是一種完全的自由和絕對的自主。當然我應該誠懇地向所有為青春付出汗水、鮮血以致生命的無辜朋友們表達我的歉疚。但是，我終究不隸屬於別人，別人無權代表我。

此外，我還對運動中的強制行為感到反感——無論是罷課、遊行還是簽名，幾乎所有表達態度的時候，總有人在你的身後盯著你、逼你表態，不是以正義的名義就是以集體的名義。大家習慣於將這場運動稱之為“革命”，我不了解“革命”的實質是什麼？也不了解這次運動中所提出的綱領內容中有多少“革命”的成份？但是，“以革命的名義”成了這次運動中常常會感到的精神壓迫。這是一個自由人所不堪忍受的。我想起六七十年代我國曾經出版過的小人書《以革命的名義》，大概是敘述十月革命的故事。也許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經驗已經深刻地灌注於中國人民的血液和精神，以致於所有的野蠻和法西斯都被冠之於“以革命的名義”，於是左派觀點大行其道。這是中國人深重的心理和精神創傷。回顧十年文革和其前其後的所謂“革命”運動，中國人中連阿Q這樣的流氓無產者都會在改變自我境遇的心理需求下，祭起“革命”的法寶，高唱“我手持鋼鞭將你打”，實在是荒唐之極、恐怖之極。真不知這樣的“革命者”手中的鋼鞭要打到何人頭上？說不定首先傷到的還是我們自己。

同時，在各色人等中間，還有些居心叵測的人，利用別人喪失理智的時機，設下陷阱，抓住別人的政治辮子，伺機捕獲獵物。我親身經歷了這樣一次考驗，雖然對方是在用一種玩笑的方式對弱勢者表達一種智力的優越。態度是遊戲而輕鬆的，而我卻感到徹骨的冷酷。在一次露天的民主沙龍上，我站在草坪上側耳聆聽。我的一位師長和他的一位朋友站在我的身邊。大家聽著、議論著。突然，他對我說，你怎麼不上去講一講？我說，我不善言辭，而且有些問題自己也說不清楚，更重要的是我的認識還不清楚。他說，沒什麼，隨便談一談，你也出一出名。我說，我不想。當時，我真實的心理除了沒有說話的欲望以外，確實對民主和自由的理論和實踐缺乏基本常識，但是我十分欽佩哪些敢於走上臺去演講的猛士。正當我迷惑不解的時候，我的這位師長突然神祕地對我說，沒關係，你去講，這是我的同學，安全部的，她可以“保護”你，不要怕。當時，我驚訝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而那位穿著米色風衣的神態平靜、一直將手插在外衣兜裏的安全部官員，幾乎是沒有表情地看了我一眼，便又繼續全神貫注地聽講了。對此我幾乎無話可說，中國人人性可怕的一面，以其血腥和殘酷，撕扯著人們的心靈和尊嚴。在這種陰謀和奸細的窺視下，一切都在黑暗的掌握之中。

在這樣的心理依據下，我幾乎是有些矯情地來到被罷課糾察隊封鎖的教室和閱覽室，靜靜地讀了兩天書，意在為正在進行的運動把一把脈，以便弄清楚我究竟應該在運動中抱有一個什麼樣的態度，也就是極力想達到看清運動發展趨勢的目的。然而我的收獲微乎其微，一則我還不具備獨立研究一種社會現象的能力，同時，現實也沒有給我留下一方適宜的空間和沉靜的心情。於是，我又被

不由自主地挾裹到運動之中了。

運動在那個逐漸變暖的春季開始加溫。4月24日，各校開始了罷課。校方知道了學生罷課的消息後，給我們全體黨員開會，嚴囑黨員不許罷課。教學樓的門楣上高懸著“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的橫幅，讓人看了激情澎湃。由此我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學生對教師實施肉體折磨的歷史。師生既定關係的超越常規的被打破和顛倒，構成了教師生命悲劇和學生靈魂悲劇的根源。小到師生之間，大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革命似乎注定與血腥相連，這使人不寒而栗，使我的靈魂發生著不斷的碎裂，我的大腦開始暈眩。罷課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簡直就是一種喜訊：我平時就非常厭惡上課，將自己在臺下聽老師萬世不易地宣講中國革命顛撲不破的真理看作為笑話，而且自己非常厭惡考試，因此罷課之舉與我的厭學傾向暗合，於是我便積極地參與了罷課。事實上，我們當時已經失去了上課的條件，學校對於學生的行動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平日裏那些道貌岸然的政治工作者此刻不知道在哪裏向隅而泣？

這是真正的教育的失敗。試想，如果我們的師長在學生的心目中真的成其為師長，他們的學問、人品和道德都堪為師表，那麼他們的引導是完全可以影響學生的。我們缺乏的正是這樣具有人格和思想權威的師長。而且與此恰恰相反，我們心目中道德文章俱佳的老師，差不多個個都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面，代表著社會的良心和知識分子的良知。

“四二七”大遊行

眾所週知的“四二七”大遊行就發生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中。原因在於“四二六”社論的催化。4月25日上午，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對動亂的性質作出了深刻的分析：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可以想像，任何一個中國當權者，革命江山坐得穩穩的，不否定這場運動才怪呢！何況還有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對知識分子洞燭幽微的警惕和毫不容情的態度？於是，4月25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先後播出了《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相信每一個親身經歷這場運動的人，都會終生不忘來自黨中央的聲音的強烈震撼。記得當時我想，完了，中央否定了這場運動，將來學生必定遭到秋後算帳的下場，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以輿論的方式參加的政治活動都不曾取得過真正的勝利，這次看來也概莫能外。我覺得，也正是因為這樣壓制的聲音來自於中南海，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部分運動參加者當時走上了背離政府、一去不回的道路。

然而，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絕大多數人都十分反對社會的不公正和官場的腐敗。在此有必要將普通的運動參加者與那些持不同政見者加以區別。因為任何歷史的真正主體並不是少數精英和持不同政見者，而是廣大的基於個人的意

願而參加社會運動的個體集合。一個能夠取得最後勝利的運動的必要條件，首先就是精英與廣大 人民集體意願的充分結合，而那些固執於個人理念並力圖將個人理念強加於全體民眾的精英，最終都將背叛他最初的理念，被運動本身拋棄在外。毛澤東及其所領導 下的中國革命的實踐，就極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4月27日北京的大遊行，其勢頭之猛烈，規模之宏大，據我所知，超過了所有的民眾運動。這天早晨，我們還在睡夢中的時候，就被高昂的喇叭聲從床上拖起。我當時多少還囑於組織上關於不得參與罷課遊行的禁令，在是否勇往直前地參加這場運動還持有觀望態度，便沒有直接投入到這場大遊行的行列中。但是，如果拋棄 種種雜念和共產黨員的身份，我肯定會義無反顧，雖然我還沒有“覺悟”到反政府和反黨的程度，我參與運動的初衷僅僅局限於在普泛意義上對現實社會的反叛。可以說，我就是簡單地支持不同政見者的現實的土壤。

我避開怒吼的人群和行列整齊的隊伍，獨自一人來到教室，只是為了走一個過場——我是來上課的。此舉只是為了將來向組織便於解釋——我並不是罷課的參與 者。當然，教室裏空無一人，老師都沒有來，我的“自我上課”成了我心中最可恥的陰影，也是我不覺悟、不願為群體奉獻犧牲精神的寫照。沒有人知道我的劣跡， 沒有人譴責我的行動，我只有在深夜任憑良心嚙咬我的靈魂。然而，我沒有出賣過任何人，也沒有欺騙過自己的真實內心，我只是想得到運動殉難者——那些無辜的 祭獻者寬宏的諒解，請他們尊重我的個人選擇。



可以說，在這場大遊行中，我採取了一種純粹的觀望態度和游離姿態。我離開教室，旋即在隊伍外面跟著一起行進。我不是一名勇士，只是一個看客。而我的同學 們則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他們與早已橫列在大路中央的武警戰士對峙，甚至發生衝撞，最後沖過一道道封鎖線，一直來到運動的聖地天安門廣場。後來我的一個同學——他曾親身經歷與武警戰士的衝撞。他說，很好玩，心裏也有些害怕，就在與武警戰士衝撞的過程中，他偷偷地朝一個武警戰士的小腿踹了一腳。他說話的神態 顯得十分猥瑣，同時還有著一絲偷了東西後未被發現的小興奮。我不知道這樣的人與“革命”有什麼關係！

我則早已來到天安門廣場外圍，自由地斜臥在長安街中心正對著天安門主席像的中央，以一個看客的身份，看那長長的隊伍穿過天安門城樓。此刻我感到屈辱而自由。這種自由的快意主要得自於一種無政府意願的實現，這種屈辱則得自於離群的恐懼和對於絕對正義和獻身精神的背叛。我現在知道，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傾向 於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儘管我現在以我不算光彩的歷史敘述玷辱了自由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但我還是要將當時作為我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起點。我嚮往這種思想觀點，相信自己經過學習和思想的錘煉，會純粹起來、成熟起來，洗刷自己青年時代由於思想不純正和無信仰帶來的恥辱。

“四二七”大遊行結束後，整個運動進入了休眠期。作為一個曾經不是純粹參加遊行和抗議活動的人來說，我感到有些身心俱疲。然而，對於那些始作俑者，則是進行進一步總結和提出更為深入人心的口號的時候了，於是，堅守在各個崗位的人們開始提出類似“非暴力不合作”的口號，運動在暗地裏醞釀著新一輪政治鬥爭的狂瀾。我們在校園裏則開始整理自己紛亂的思緒，校園裏甚至出現了以麻將術語組成的嘲諷性對聯。5月4日遊行的參加者就很少了，看來以弘揚五四精神的民主口號也不是那樣深入人心了。在我看來，中國人的一切行動，完全決定於政治的需要，當政治目的的實現成為空中樓閣的時候，人們自然會退到自己的小天地裏，想辦法打發餘下的光陰。當時，我甚至覺得五四以後就該復課學習了。當然，樂於看熱鬧的我還是覺得僅只如此有些不過癮，難道這樣鬧了一場即將不了了之嗎？

廣場絕食風潮



就在5月4日這一天，學校的大禮堂里士滿為患，眾多的知識分子精英聚集一堂，當著全體師生的面，討論對這場運動的定性以及前途問題，從而將這場運動將熄的暗火撥得更加明亮。5月13日，北京開始了部分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的絕食鬥爭，社會上的傳言愈加蜂起，運動在輿論的鼓動下漸成擴大之勢。當時，黨中央出現了以趙紫陽為首的不相同的聲音，中國的民主事業似乎即將出現一絲曙光。校園裏出現了聲援廣場絕食學生的通知，天安門廣場因為絕食者的行動而倍受矚目。我的同學中也有相當的人們參加了這場絕食。當時，我覺得絕食是一種在特定時機下的過激行為，別人參與我不反對，因為這裏面有著人家的政治抱負和民主理想，然而我本意是不願意參加這種行動的，我不知道這樣是否會直接導致民主的前景，而且民主是什麼？我也大體上缺乏了解。如果換一種更為直接的口號，比如說爭取一種校園民主試驗的權利【近】，真正可以在暫不觸動現體制下的情況下，進行有效的民主試驗，在一定範圍內以法律的形式將一定的民主權利固定下來，那麼我是願意為這種看得見的東西付出實踐的。一句話，我對可能受到別人的利用格外警惕。

天安門廣場絕食風潮的興起，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神經。我於5月17日前往那裏觀察事態的發展，同時為同學們捎去棉大衣和毛毯。整個廣場的氣氛悲壯而慷慨，除了限制人們進食之外，其他各種物資十分充足，我們熱心帶來的衣物看來是一錢不值的。街道已經全面阻塞，工人、農民以及各界人士紛紛走上街頭，為絕食的孩子們獻上一份愛心和關懷。許多知名人士一面呼籲停止絕食，一面呼籲政府對學生的要求作出答覆。一陣陣拉長的救護車的警笛在生死線上穿梭往來，每一聲鳴叫都挑動著我焦灼的神經。我知道，在廣場上損害健康、為民主而戰的人們中絕大多數都是我的血肉相連的好兄弟，我沒有理由在他們付出犧牲的時候在校園中逍遙。然而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為反帝反修而忠誠奮鬥的人們，事後總會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這對於當初



他們赤誠的青春，是一種無情的嘲弄和絕大的諷刺。我在痛苦的煎熬中彷徨，不知該何去何從。同時，我還聽到這樣的傳言，某些曾經出入於絕食圈的人們談起他們蜻蜓點水般的感受，總是會不由自主地談起可以無限制地吸萬寶路捲煙，喝大量價格昂貴的營養液，同時，還在露宿時與某某女同學共蓋一條被子，在夜色和被子的掩護下，作一些下作的勾當，甚至還有的人在此期間以不嚴肅的態度勾引單純的不相識的女生，作起了短暫而不負責任的露水情人……凡此等等。我是一個嚴肅的悲觀主義者，我的內心對這樣內容“豐富”的鬥爭不能認同。後來我還聽說過這樣一個政治笑話：說是當年紅軍某部在井岡山割據遭受敵人圍攻的時候，眼看陣地不保，一位紅軍指揮員大聲在陣前對貧苦百姓出身的戰士鼓舞士氣時喊道：“弟兄們，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個女學生！”這樣的的笑話之所以深入人心，完全在於它出自於老百姓的極高智慧，而且，它還極有可能是當時真正鬥爭情形逼真反映。試想，如果對於阿Q一般的中國老百姓，僅僅用“共產主義”前景來號召，而不靠“秀才家的象牙床”和“平分土地”、“減租減息”來吸引，誰來參加隨時都會掉腦袋的狗屁革命戰爭？這不是革命革到了自己頭上了嗎？

對於書寫歷史聖徒般的莊嚴感和對於運動參加者五花八門動機的觀察和了解，使我不能不產生對運動前景的擔憂——憑某些人這樣的素質，運動能夠成功嗎？但是，5月17日這一天，我還是幾次衝動地想投入絕食的行列，但每次都被嚴格的糾察人員拒之圈外，可謂“不得其門而入”。我在絕對自主、毫無限制的特定時空下，失去了參加絕食的權利，這又是另一種強制。當然，我對於所有這一切的認識，可能存在著很大偏頗，但我習慣於看到那些缺陷的東西，這來源於我的妄自清高、悲觀主義和無理想。

5月17日之夜，我在天安門廣場觀禮臺下和衣而臥。一夜的煎熬，使我感到萬分困倦。所以18日凌晨，我便悻悻地回到了學校。

就在這一天，我班同學已經有人因絕食被送往醫院，消息傳來，我真的坐不住了。於是，我不顧班主任老師“好心”的勸解，從床上一躍而起，來到校門口，搭上一輛大卡車，奔赴廣場。我站在卡車上，看到長安街上擁擠的人流，心中不禁生出一種擔憂：這樣的混亂何時才能結束呵！

我們來到前門附近，不巧遭遇了一場大雨，我為過夜專門準備好的棉衣被淋得精濕，同車的一位長者將他的雨傘遞給我，然後轉身和自己的女兒共用一把雨傘消失在一片雨霧之中。我現在還保存著這把雨傘，然而已無法歸還，它是我運動和在運動中對美好人性的唯一紀念。正是借助這場大雨，我得以進入了昔日重重封鎖的絕食圈，開始了我僅有16小時的絕食。

我登上我班同學所在的避雨的大客車，見到的是面露菜色的人們。他們緊緊圍擁在棉被中，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我簡單地和一些同學打好招呼，見他們也不是很熱情，心中的熱情和關切就暗自低落下來了。我的棉衣已經被雨水淋透，加上時間向晚，外面瓢潑大雨的雨絲夾著冷風捲進四面透風的車廂，為我低落的情緒又加上一絲寒意。我沒有被子蓋，只好蜷縮在車廂的連接處，忍受著最初的飢餓，和已經連續多日絕食的伙伴們一起渡過漫漫長夜的每一分鐘。車

廂裏的人們已經睡著了，沒有睡著的人們也只是 睜著幹澀的眼睛，在暗夜中偶爾傳來大聲的咳嗽。這是一個行將走到盡頭的群體，此刻他們絕望而無退路，只好憑著毅力堅守在不能回頭的絕地，苦苦地等待著政府 的答覆。我覺得，一定是最初的亢奮已經消褪，我的同齡人在還不懂得政治以及全部計劃的時候，成了別人而不是自己籌碼，而一切退縮又與自己在迷亂之中發出的 誓言相違背，這究竟讓我們如何是好？

半夜的時候，雨住了。淒冷的燈光映照著被雨水打濕的廣場，反射出刺人雙目的光芒。我緊閉起雙眼，忍受著寒冷和飢餓，在憂傷中漸漸睡去……不知是什麼時候，有人登上車廂，叫醒糾察隊員，說是防止有人登車強行將學生帶出廣場，並將汽車的輪胎放氣。我的心隨著汽車車身的沉降冷到了冰點，看來是無法離開這讓人 無可奈何的地方了。此刻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心靈的囚徒。

清晨傳來消息，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聽說趙紫陽意味深長地告訴學生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究竟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說：“你們還年青，來 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等等。這是一句流行甚廣的哀嘆。很多人在這句話中聽到了某種信息，而我卻感覺並不明顯。



復食與戒嚴



黎明的到來又給新的一天帶來希望。我渴望著事態能夠在新的一天裏發生變化和奇跡，可是我有什麼根據這樣渴望呢？我隨著人流來到革命博物館前面的簡易廁所 方便的時候，曾經想到要到外面去找些吃的。但是被自己的良知所阻止了。別人已經堅持了這麼長的時間，而我只是剛剛開始，我怎麼能有這樣無恥的想法？可是等 到我回到絕食圈的時候，已經傳來消息：絕食宣告結束。馬上就有人送來大批的餅乾和礦泉水，多日被飢餓所困擾的人們擁向那裏，就像歡慶著人民解放軍進城一 樣。這一切與人們一貫的表現以及頭上戴著的絕食布條互為映襯，表現出一絲生活原生態中的矛盾與不和諧。

班主任老師也適時地來到了絕食現場，親熱地和同學們談心。他勸說我們要回學校去，要相信中央能夠恰當地解決問題，同學們要學會用自己的眼睛觀察變化中的 世界，免得被壞人利用等等。我知道，他之所以來到現場，肯定是身負校方和政府的重托，在此之前條件並不成熟的時候，他對廣場這個詞避之唯恐不及，我不願搭 理他，遠遠地坐在人群的外面，相反倒是那些絕食十分積極的人團團圍坐在他的身邊，仰起向日葵一般的笑臉，恭恭敬敬地聽他“巧妙”地布道。

就這樣，我們中的一些人隨著老師回到了學校。晚餐的時候，我們來到實習餐廳，打算慰勞一下連日虧待的飢腸。正在我們剛要吃飯的時候，鄰桌的同學湊

過來，向我們傳遞了一個令人大吃一驚的消息：政府決定對北京實行戒嚴。

聽到這樣的消息，我當時感到頭“轟”的一聲，血往上湧，心中十分緊張。我不知道戒嚴意味著什麼，是不是要對學校進行軍事管制，禁止學生的自由行動並進行追查？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將面臨著十分嚴酷的政治形勢。我們這些在運動中對自己的行動說不清楚的人該怎麼辦？同時，廣場上還有很多靜坐示威的人們，他們該如何面對即將到來的武力威脅和政治懲罰？我們在學校裏面神色慌張地到處傳遞著即將戒嚴的消息，並且試圖聽取一些尊敬的師長的意見，得到的幾乎都是堅強、鼓勵的目光和語重心長的期望：同學們，你們要堅持住，真正的勝利總要經過嚴酷的鬥爭才能取得，爭取什麼樣的前途，完全取決於你們自己的努力。

這樣的鼓盪成為我繼續保持熱度的唯一理由，但是這種熱度卻沒有能夠持續多長時間。我一以貫之的懷疑和猶豫，加上長期以來莫名其妙地奔波勞碌，使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忙些什麼，我在運動發展的關鍵時刻徹底迷失了方向。我警惕盲從，但又不知道該如何走自己的道路，疲累和心靈苦悶使我回到校園，開始了對這場運動的反省。我最後一次來到廣場的時間是5月20日白天。從這一天開始，我一無所獲，靈魂和軀殼分離，目光散亂地走在陽光下。

脫離運動

我幾乎是在運動的關鍵時刻離開了運動，在宿舍裏潛形，在麻將桌前輾轉。我只是簡單地關注著運動的發展，順口問一問有什麼新聞。在後來大約一周的日子裏，在我看來，整個運動開始陷入無核心狀態，每一個對運動抱有熱情的人們行蹤詭秘，肩上背著電喇叭，手上搖著小紅旗，見面就道“堵軍車去”，隨後就消失於如潮的人群中。他們經常是幾天都不回學校，不知道他們在哪裏，幹些什麼，這其中就包括著我的女朋友。當時我們的關係已經很淡了，彼此之間不太關心。我不左右他的行止，他也不干涉我的選擇。

有人在麻將桌上對我說：“他媽的，有什麼勁？想造反就上山，這樣下去一事無成。”雖然我的思想水平和造反精神距離這位老兄相差甚遠，但我逃避的內心要找到一個自我安慰的理由——我不參加運動不是因為怕死，而是因為我不願意參加這樣被一些庸人和野心家所領導的政治賭博。於是我便附和這位老兄的言論，“就是，他媽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是我的一大弱點，不能理直氣壯地明言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不同意見人多勢眾的時候。也就是這個原因，釀成了我思想、性格和正義之間的巨壑鴻溝。

大家的思想交流因為忙亂而日漸稀少，廣場上和堵軍車前沿傳來的消息讓人啼笑皆非，政府和部隊的克制態度也似乎到了頂點，無知的人們卻還是火上澆油，為發泄心中的不滿，瘋狂地擴大著混亂而自由的事態……

我還是一個有良知的人，脫離運動的我，時時刻刻感到一種落寞和靈魂的無可皈依。看到別同學仍舊興匆匆地在運動前沿奔波，我的心中萬分愧疚，但我要甩掉自己的想法，根本盲從於眾人的群體之中，我實在勉為其難。同時，我開始感到一種與廣大同學心靈上的根本疏離。我已經不能在北京這樣的環境下呆下去了。

5月26日，我匆匆告別了學校，背著一個簡單的行囊，蒼涼地回到了故鄉。後來回想這一幕，我有些後悔。我當時大概就像一個灰溜溜的變節者、一匹受傷的孤狼，告別了火熱的運動和生活的主題，回到遠離運動中心的故鄉，在山水田園之間舔自己的傷口。當然，我還是試圖在書籍中尋找運動中應有的態度，在離京的火車上，我守在車窗邊，手中捧著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靜靜地在閱讀中求索和反思。

我不能預料並無法想像解放軍最終會強行進入廣場並向著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射擊。儘管政府在通告中不願意承認向學生開槍的事實並作出種種牽強的解釋，我仍然無法相信。它使我最終認識到政治與人性之間無法統一的分野。在政治利益面前，人性的份量實在太輕，任何人的奢望和渴求都是生命本身所不能承受的。

開槍之後

6月4日這天，我看著電視上的宣傳，心中莫名其妙地傷悲。親人們不明就裏地對我說：“你真幸運，趕在開槍之前回來了，要不然家人會多惦記，你是怎麼想的？”還有人公開在我面前議論說：“看人家多聰明，不像某某人家的孩子，現在還沒有回來，他媽每天都在做惡夢！”我每次聽到這些議論和請我傳授經驗的詢問，都感到心中的悄悄地滴血。我該如何面對那些在槍口下飲彈的無辜而不知情的烈士？如何面對那些在恐怖之中堅持最後鬥爭的同學們。

我站在煦暖的陽春裏，心中感到徹骨寒冷……

6月20日，我因為個人原因趕回北京，心中極想了解事件的經過。但是學校裏早已是人去樓空，顯出寂靜和空落。我明顯地感到在遭受重大挫折後人心的幻滅和生活的無意義。我們為了什麼活著？我們該如何活著？這是一個擺在每一個人面前的重大課題。陽光下站立在橋頭的戒嚴部隊戰士，紋絲不動，以年輕的身軀捍衛著一個不知其表裏的權力，甚至為之作出令人痛心的犧牲。他們和我們所有的同學一樣，都不知道為誰流血，這是我們民族最為悲哀和最可悲哀的地方。我在校園裏遇見了一位同學，他向我緊張地描述了大劫的情景和逃難中的慌亂。因為不是我的親眼目睹，我不便將別人的轉述在這裏當作第一受材料告訴給人們。但是，我知道人們都不約而同地傳達了一個信息，解放軍在政府的指揮下，向著手無寸鐵的人們扣動了扳機。群眾的鮮血染紅了長街和廣場，也為劊子手的晉升之路鋪灑了紅氈，民運分子們早



已買好了機票，在大變前夜紛紛逃往自由世界，繼續為生計揮舞手中可恥的小旗。歷史就是這樣簡單重覆的：100 年前的北京菜市口，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為中國的新生，以普通人為民族負責的態度血祭古老中華，而今天的天安門，再次以無名烈士的鮮血紀錄了中國人為民主奮鬥的道路。真正被歷史銘記的將不是方勵之、王丹、吾爾開希，而是那些真正為中國民主拋灑熱血的無名鬥士——我的同學們。需要反思的是，人們心中所想和真正實施的行動之間有著怎樣的距離？它們是怎樣產生的？這種思考是一個在民主光環之下的理性公民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

這天夜裏，我蹲在宿舍的床上收拾東西，一陣心悸襲來，我承受了第一次來自心靈和肉體的真正恐慌……

8 月 23 日我們開學了。洗腦也就隨之開始。沒有人出賣他的弟兄們，大家齊心協力地回答著“不知道”和無關痛癢的問題，代班教師也馬虎行事，只求平安渡過這個嚴酷的夏天。這也是人們在 50 餘日鬥爭中所得到的唯一收獲吧。出乎意料地沒有重壓，這也許是政府唯一的高明之處吧，它使我們中的某些人失去了當叛徒的機會，於是個人的尊嚴得以保全。整個學習沒有揭發，沒有指責，沒有反抗也沒有堅持，仿佛過去的是一場夢。我感到，這也許是現代的麻痹政治吧！大學是非常敏感的地方，領導者已經認識到十年教育的嚴重失誤，他們要在寬鬆的旗幟下收拾舊山河，收拾散亂的人心了。可是對於社會上的其他領域呢？暗地中的秋後算帳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混蛋邏輯還在繼續。

我不得不再次戴起面具，苟且地活著，繼續在自己的臉上塗抹著我宿命的恥辱。嗚呼，但願這不是我的一生。

整個社會在運動過後沒有靈魂地持續著。

一個復員坦克兵的遭遇



人們似乎忘卻了那血染的 6 月，忘卻了長安街的青石板上留下了青年的鮮血。代替運動之前社會上通行的對於民族和國家的憂患感的，是王朔式調侃和後現代解構思潮的大流行。然而，我的一個朋友，卻無法忘記那個創痛的日子留給他一生的陰影。

他是一個個體戶，1989 年的時候，他從部隊復員回家不久。在此之前他是一個出色的坦克兵。

對於他個人來說，對於民主和政治既沒有常識也缺乏興趣。他只是希望，這個國家只要能夠給他一份穩定的工作，自己能夠通過勞動獲得應得的報酬以養家糊口。就在這次運動中，他還從一個軍人的立場出發，認為這些當兵的太苦了，不理解學生們為什麼要以他們為鬥爭對象，大家都是“人民的子弟”嘛！我

對他的看法不以 為然，但是也沒有理由和必要與他爭個面紅耳赤。但是他在運動後的一場遭遇卻使我萬分感慨——

運動結束後，雖然學生們表面上沒有受到過於嚴酷的責難，但是社會上的清查工作確是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我的朋友的家門前面的大街上，有一輛解放軍的坦克被燒毀，因為他出身於坦克兵，所以他就成了重點嫌疑對象。因此，他被抓進監獄長達半年之久。

在這半年之中，他吃了很多皮肉之苦不在話下，看守們只是讓他寫交代材料，迫使他承認是他利用了專業知識燒毀了解放軍的坦克。我的朋友是一個典型的良民，沒有任何不端的行為，對於這樣一種莫須有的罪名，他實在是難以屈辱地接受，而且這樣接受下來還會造成難以預料的嚴重後果。他在監獄中保持了堅定的信心，相信總有將事實說清楚的一天。

半年過去了，沒有人提審他，也沒有人給他下一個結論，更沒有人向他道歉。他糊裏糊塗地被抓進監獄，又被不明不白地釋放。他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是嚴酷的事實告訴他：他沒有跟國家機器說三道四的權利和機會。他只有承受這些強加在他身上的不幸。他走出監獄，沒有回頭，認了命。

這就是在國家專制制度下，人民普遍的悲慘命運。

結語

後來，我時時在為這場運動苦苦思索，但沒有得出任何經得起推敲的結論。

也許是一場錯誤，但這場錯誤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代價都過於沉重。我們不能從失敗的結果出發，否定所有人曾經為之激動、為之奮鬥的民主理想，否定自己全部青春和全部赤誠。

中國人最深刻的悲劇在於在這塊生生不息的土地上，人們總是以專制的方式去反對另外一種專制，以民主的旗號建立一種反民主的政治，這就是中國千百年來封建統治和封建思想綿延不絕的真正原因。什麼時候中國人真正建立一種理性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民主的海市蜃樓才會成為現實的藍圖。

1998 年 4、5 月間動筆

1999 年 1 月 27 日初稿完成

1999 年 3 月 29 日第一修改稿完成

1999 年 12 月 26 日上網前修改